

# 家庭、社会与国家：读一位普通农民的家史

■刘进宝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承主要是靠家学和师承。世家大族由于经济和文化的优势，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进入近代以后，在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如新会梁家（梁启超、梁思永、梁思成等）、义宁陈家（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等）、德清俞家（俞樾、俞平伯等）、东至周家（周叔微、周叔迦；周一良、周邦良、周绍良等），都在近现代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相比于东南沿海，地处内陆西北的甘肃，唐中叶以后逐渐封闭，直到近现代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不过，甘肃也并非没有出现过文化世家，如水氏家族（水梓；水天同、水天明、水天长、水天中、水天达等）就是其中惹眼的存在。由于水天长是我的老师，再加上我与水家的下一代也有来往和接触，对其家族历史，故也知道一些；而读了水天中编《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术出版社2006年）后，对水家的故事有了更多了解。

上述家族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相当地位，尤其是其后代从事文化教育的情况比较多，其家族史得以记录下来。但是，对普通民众的家族史、生活史，我们往往缺乏了解，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同样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不该被漠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我读到陈贵辉的《陈家沟延鼎家史》时，颇有眼前一亮之感。

《陈家沟延鼎家史》（以下简称

《陈家沟史》）记述的是甘肃永靖县陈井乡陈家沟村一位普通农民的历史，是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立传——按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这样的普通人是不可能入史的。因为我和作者的家庭、年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读起来更感到亲切，该书写的似乎就是我的家庭、经历和感受。

—

父母是家庭的核心和主心骨，也是孩子最初的老师。作者的母亲“自幼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乡学教育，养成了贤惠、勤劳、俭朴、宽厚、仁慈的品德”（《陈家沟史》第78页，以下注引本书只注明页码）。这种品德也普遍存在于旧式中国妇女身上，即心中只有长辈、丈夫和子女，唯独没有自己。“母亲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下工后回到家里，跪在地上扫羊粪和树叶，为年迈的爷爷、奶奶填炕取暖”；从地里劳动回来，背上还要背一些柴草，到家放下背篓后“也不休息，就开始忙着做饭”（79页）。晚上，母亲就在煤油灯下捻麻绳、纳鞋底、做衣服，常常是干到深夜。母亲每年给全家八口人，每人至少要做两双鞋。每次饭做熟后，先端给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然后再分给我的兄弟姐妹，有剩余了她就吃一点，没有了她就不吃。”（80页）这是作者写自己的母亲，但似乎又是我母亲的真实写照。正是这样真实而细腻的描述，中国北方

农村一个小脚老奶奶的形象就定格在了我们的眼前。

父亲在一个家庭中的支柱作用是永远无法取代的。作者的父亲虽然是农民身份，但他读过初小，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可以算是个文化人。一初中毕业后，曾在兰州西关什字钟表店、丝绸店干过活，新中国成立后又到兰州市西固百货公司、白银汽车运输公司、刘兰公路、刘家峡水电工程局筹备处等单位工作。1962年因刘家峡工程下马就回了家，在陈井供销社当会计，1966年因家庭成份原因被清除。

正因为作者的父亲陈延鼎见过世面，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长期生活在山沟中、没有出过山的农民相比，更具见识和智慧。知道“多读书、学技术”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所以就想方设法让大儿子学兽医，让二儿子学画棺材。当“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又省吃俭用，尽最大力量供三个小的儿女上学读书。从本书的记载可知，虽然作者陈贵辉兄弟姊妹5人由于时代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但都有勤学、悟道、乐善、聚力、健康的品行。他们的下一代8人，也全部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

正所谓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是人生的第一课，作者及其下一代陈家人的良好品行，正是父母吃苦耐劳、积极进取、与人为善的品格潜移默化化的结果。如在聚力方面，作者1982年考入宁夏民族学

校（中专），“大哥送我去临夏上学，给我买了一条新裤子，二哥为我准备了一件旧的蓝夹克和一件黑条绒上衣。这三件衣服，我一直穿到了毕业”（131页）。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大哥、二哥的这种付出，是一种无私的爱和亲情的具体体现，使小的更加尊敬大的，大的也更加关心小的。正是这样的互相帮衬，才使失去父母的兄弟姊妹能够身心健康地长大成人，而且还养成了互敬互帮的好传统，并一直延续下来。作者的父亲去世（1985年）三十多年来，“兄弟姊妹五人，五个家庭，有事没事常联系，生活工作互帮助。乡亲们、亲戚们对我们姊妹和睦相处，心凝聚聚充分认可，有的还发自内心的羡慕”（172—173页）。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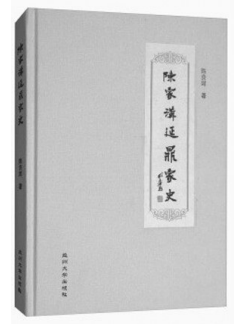
如果说，《陈家沟史》只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生活的反映，那也仅仅是家族内部或亲朋好友之间赠送、阅读或保存的纪念品。可喜的是，《陈家沟史》虽然是陈贵辉写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但同时，还具有史家的眼光和见识。如在撰写其家族的前史时，不仅想法找到了家族在明代最权威的资料《兰州卫右千户所陈伯助供状》，为了了解伙仗，还专门购买了《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等专业书籍，请教陕西西

范大学梁志胜教授等专家，从而使其写作具有了史家的严谨。

作者在撰写其家族从安徽合肥作为军户迁兰的原因、过程及到兰后的生活时，不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查阅了许多地方志的记载，而且还走访了一些老人，这样就使其写作更具客观性。作者从《永靖县志》查阅到：陈家祖籍安徽合肥，“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兄弟二人随官来兰，老大陈超以军功百户职定居兰州陈官营，老二定居今永靖县西河乡黄草岭陈家沟。明末陈超部分后裔从兰州陈官营迁居今永靖县陈井乡陈家沟村和小岭乡陈家山村”（4—5页），这样就对陈家的来龙去脉有了明晰的介绍。由此，也让读者对明代兰州的军户、明长城及后来“军屯转变为乡村的营，军屯官兵亦随之转变为甘肃的劳动人口”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而这样从一个普通家史所提供的视角，显然是传统的史学论著无法比拟的，可补已经出版的《西北通史》《甘肃通史》《甘肃古代史》等史学著作欠缺细节的不足。

虽然本书“从明朝初年太祖陈超从庐州府合肥县军屯徙兰州开始写起，止笔于2016年底，时间跨度几近七个世纪六百余年”（209页），覆盖时段很长，但最主要或最丰富的还是近七十年的生活画卷，即陈延鼎和作者陈贵辉两代人的故事。因此，这又是一部当代中国的乡村史、社会史、风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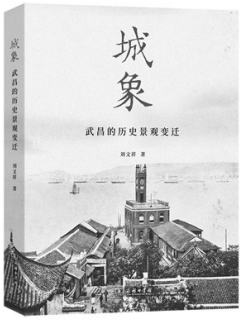
书中对20世纪80年代初陈家沟农村“玩社火”的描述，尤其是对



《陈家沟延鼎家史》，陈贵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2018年5月第二次印刷，116.00元

太平鼓、舞龙、舞狮、跑旱船、高跷、竹马、推车、跑驴、妖婆子等表演艺术的详细记述（第122—124页），对父亲丧事的办理，如停尸、邀请村民和“照事”、邀请阴阳、上神主、制作铭旌、吊丧、迎接骨主、领羊、念经、入殓、待客、起灵、下葬、宴请等丧事过程的叙述（138—142页），是当代中国社会史、民俗史研究的绝佳材料。其中的照事（婚丧事管家，一般是本村有威望的人）、骨主（父亲的舅父家，俗称“外家”）等词汇，可能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了吧？

国人的习惯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都是后代人在写前代的历史。当后人代人在写前代的历史时，由于所保存档案资料的局限，写作者的喜好、史观、史识等的不同，都会对本来就稀少的材料有所取舍，留存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干巴巴的条文，缺少的则是丰富细腻的底层生活的真实记录。而本书恰好对我们了解近70年甘肃农村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从而使其超越了家族史的范围，进入了中国社会乡村史的视野，这可能是作者没有预料到的吧。



《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刘文祥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第一版，68.00元

补充史料、理解史料之余，也是直接的研究手段。本书中大量使用航拍照片，比如武昌门遗址考古现场、无影塔、黄鹤楼、龙泉山楚藩王墓、梳妆台遗址、武汉长江大桥、起义门等。可以看出，作者为写作本书走遍遍了武昌的大街小巷及周边遗址遗迹。这种行走所获得的直观体验感对城市史的研究是极有必要的，体现在本书中，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亲近感。

整体而言，《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适合大众阅读的公众史学读物。学术的研究成果，不应该留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应该走向公众。这不是简单地讲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也谈不上增强自信心自豪感之类，而是公众参与到历史的重温、叙述、实践中来，能让人与所在城市的历史，现实产生关联和沟通。我认为《城象》一书可以做到这一点。



《中国昆山昆曲志》，《中国昆山昆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陵书社2021年7月第一版，580.00元

汇聚100多个剧种，演出100余场，前所未见，盛况空前，昆山、昆曲、戏剧融为一体，堪称完美。又如“小昆班”一节，专述昆山各小学校成立小昆班及其培训与演出情况，这是昆山振兴昆曲“从娃娃抓起”的有远见的创举，让人对昆曲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书的编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以二维码方式附录演出视频和延伸阅读内容等，是广大读者和昆曲爱好者的福音。读书看戏，相得益彰，这对于昆曲的普及大有益处，对于昆曲的传承将发挥积极作用。

# 细节里的武昌城史

■夏增民

说到武汉，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可能就是黄鹤楼、辛亥革命、交通中心，可能还有长江、工商业城市等一些模糊印象。刘文祥《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则是对武汉城市历史的“深耕”之作，书中把近2000年来武昌城市空间的发展、城市景观的演变、城市历史的变迁娓娓道来，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由于资料相对缺乏，学界对古代武汉的研究很多时候只是做宏观的探讨。但是，宏观、整体的研究也必须要有细致扎实的微观研究做支撑。进而，城市历史的细节不仅是城市宏观历史的基础，更是展现城市魅力之处。《城象》在宏观上重述武昌城市营建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对历史细节的把握。

比如公众熟知的黄鹤楼。可能大家都知道黄鹤楼在历朝历代屡毁屡建，甚至可能对其形制、外观、风格上的演变也略有所知，但具体是怎样的变化，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文化寓意，大概就不甚了了。本书举出康熙《湖广通志》、雍正《湖广通志》、乾隆《江夏县志》以及乾隆四十二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折所附武昌城垣图中所见到的康熙朝时期黄鹤楼的图画，再与文明时期比较，发现两个时期的黄鹤楼形象迥然不同；清代的黄鹤楼虽然层数加高，但建筑形态显得单一僵直，且不再为

官式风格。本书并未谈及这种变化背后的具体原因，不过，这也许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政治、文化上一大关节，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书又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明代《黄鹤楼图》、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宋旭《山川名胜图》、明《道藏》收《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中的黄鹤楼形象，不仅揭示了明代黄鹤楼不同于一般民间建筑的不凡建筑等级和身份，也揭示了黄鹤楼在明代的营建和修缮与楚王府有着密切关系。这个发现，对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大概也可略备一解。

提到楚王府，本书可以说是学界第一次对武昌城内楚王府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详细考证、梳理，从而揭示了明楚王府的四至范围及其外“王城”的轮廓，详述了楚王府的建筑布局如中轴线、宫门、殿堂建筑群位置和“王城区域”礼制建筑楚藩宗庙的方位和布局，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武汉史乃至明史的研究空白。

再比如对武昌城城墙的研究。近代以来，照相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让照片成为历史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本书通过图像史料对武昌城城墙的探讨颇为深入细致。美国地质技师马·栋臣（Frederick Gardner Clapp）拍摄的武昌城（1915年），更多的是展现武昌城的全貌。而上海《天民报图画附刊》则不同。1926

武昌拆城之际，该报特派记者专门用镜头记录了武昌城的十座城门，真实、直观反映了城墙、城门的建筑风貌、走向及细节，这些都是单纯依靠文献资料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关于武昌城墙，熟悉武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口出于军事防守的考虑于1864年修建了城墙，但很多人不知道，大概与此同时，武昌城也曾经过1860年在外围进行了一次扩建。据本书的介绍，新扩建的城垣大约在今天鲁巷以西一带，东北起东湖南岸，西南抵湖北岸，并设有东便门、东湖门、南湖门和南边门四座城门，城外还挖有护城河，连通东湖和南湖，将武昌的城防体系大大向外推展。武昌城西、北为大江，东为沙湖、东湖，南为南湖，出大东门仅有一条陆路通往大方向。这道城垣的修建，极大地增强了武昌城的防守能力。

从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料看，太平军与清军数次交战于鲁巷地区，可能就是与此新建城垣有关。不过，这道城垣应该与汉口城墙及内围的武昌城墙不同，与其说是城墙，不如说是一条夯土的主要军事防守工事，既谈不上高峻，也未用砖石，以至于战事结束，便湮没无闻了。但有此一说，对公众知识而言，也属“新发现”，可资谈资。

明代武昌城有九座城门，但每座城门的命名很少有人追究。在明

嘉靖十四年整修武昌城时及以前，城门名称大多又作了改动，比如望山门在前代原称望泽门，那何以把“望泽”改成“望山”呢？传统的说法是该门为南门，远望黄鹤山，故名。这个说法是沿袭了“望泽”的命名思路。宋代鄂州城南门为望泽门，是因为城墙之外便是古南湖，一片汪洋，因以望泽为名；但事实上黄鹤山离武昌城太过遥远，是很难观望到的，因此而改称望山门，就殊难理解了。而本书把“望山”做“遥望”或“望祀”解，可谓独出心裁。按明代的礼制，藩王府宫城西南面应设置社稷坛、山川坛和旗纛庙，但武昌城西南为大江，以故山川坛改建城外东南郊，而西南城门改称为“望山门”，大概就是因为这种“望于山川”的礼制文化。这一解释合乎逻辑，也很有说服力。当然，这也只是合理的推断，聊备一说。

武昌城门的命名在沿袭旧名之外，是否有统筹的考虑呢？这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竹篱门因门内有文昌阁而改文昌门，小东门因门内有忠孝祠而改忠孝门，大东门因是城墙，不如说是一条夯土的主要军事防守工事，既谈不上高峻，也未用砖石，以至于战事结束，便湮没无闻了。但有此一说，对公众知识而言，也属“新发现”，可资谈资。

明代武昌城有九座城门，但每座城门的命名很少有人追究。在明

嘉靖十四年整修武昌城时及以前，城门名称大多又作了改动，比如望山门在前代原称望泽门，那何以把“望泽”改成“望山”呢？传统的说法是该门为南门，远望黄鹤山，故名。这个说法是沿袭了“望泽”的命名思路。宋代鄂州城南门为望泽门，是因为城墙之外便是古南湖，一片汪洋，因以望泽为名；但事实上黄鹤山离武昌城太过遥远，是很难观望到的，因此而改称望山门，就殊难理解了。而本书把“望山”做“遥望”或“望祀”解，可谓独出心裁。按明代的礼制，藩王府宫城西南面应设置社稷坛、山川坛和旗纛庙，但武昌城西南为大江，以故山川坛改建城外东南郊，而西南城门改称为“望山门”，大概就是因为这种“望于山川”的礼制文化。这一解释合乎逻辑，也很有说服力。当然，这也只是合理的推断，聊备一说。

武昌城门的命名在沿袭旧名之外，是否有统筹的考虑呢？这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竹篱门因门内有文昌阁而改文昌门，小东门因门内有忠孝祠而改忠孝门，大东门因是城墙，不如说是一条夯土的主要军事防守工事，既谈不上高峻，也未用砖石，以至于战事结束，便湮没无闻了。但有此一说，对公众知识而言，也属“新发现”，可资谈资。

明代武昌城有九座城门，但每座城门的命名很少有人追究。在明

# 《中国昆山昆曲志》：昆曲专志，非遗宝典

■曾学文

昆曲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国最早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近年来，专家学者致力于昆曲的整理与研究，佳作迭出，《中国昆山昆曲志》的出版是其中令人瞩目的成果。

《中国昆山昆曲志》是第一部关于昆山昆曲的专门志典。昆曲虽然历史悠久，然而在封建时代乃属于“末技”，不受重视，地位不高，流行不广，造成记载稀少，资料网如，要进行系统的爬梳整理，难度不小。现当代昆曲的发展虽成就显著，然仍属小众，难免曲高和寡，剧本散佚，资料分散，不少传承组织与艺人的真实情况需要采访调查，记录核实，编志者往往力有不逮，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且编撰昆曲志，实属创举，没有先例，没有参照，其编写过程之艰难，主编杨守松先生感同身受：“不知道修改了多少次，每一次都会发现问题。”

杨守松先生大学毕业后即到

昆山工作，对于第二故乡昆山感情深挚，早年以报告文学《昆山之路》驰名文坛，后来爱上昆曲，于昆山市巴城老街设立工作室，以传承弘扬昆曲文化为己任，策划演出，潜心钻研，出版《昆曲之路》《大美昆曲》等著作，享誉一时。受邀担任本志书主编后，他深感责任重大，坚持不当挂名主编，主持确定体例、提纲，亲自撰稿、审稿，是名副其实的总主编，这对于本书的编撰质量实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此书编撰工作自2018年初启动后，一直按照计划紧锣密鼓推进，初稿形成后，多次研讨，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书稿交至出版社，编辑又做了大量资料核实、文字润饰等工作，终于定稿。2021年5月，本书编纂委员会主持召开《中国昆山昆曲志》终审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书稿展开讨论，在充分肯定此书的专业特色与创新精神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订建议，为本书的完善与顺利出版奠定

了基础。

《中国昆山昆曲志》的编撰，立足于昆山与昆曲，其体例与传统志书相比较，既有继承、借鉴，又有创新发展。全书首列图版，次大事记，其后共设创立、传承、人物、文献及附录五编，分门别类，图文并茂，既照顾全面，又突出重点，以约近五十万字的篇幅，详细记述昆山昆曲的历史与现实、人物与剧目、史料与活动、名词与术语等等，堪称有关昆山昆曲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大事记列举昆山昆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创立编详述昆曲在昆山的起源、发展、传承与影响；传承编重点介绍昆曲组织的构成、演出团队以及现代昆曲在昆山的传承、普及情况；人物编主要介绍历代昆曲的代表性人物以及当今昆曲的主要传承人及新生代演员；文献编概要介绍昆曲主要剧目及演出团队的情况，收录有关昆曲的相关文献资料；附录记述昆曲堂名、曲社、演出行话、曲坛趣闻轶事

等。编写中兼顾资料性与专业性、艺术性与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阅读性与欣赏性，体例严谨，文字简练，观点鲜明，通俗易懂。

志书的真谛在于客观、求实，本书的编写就采取了十分严谨、严肃、审慎的态度。如以前人们常称昆曲为“百戏之祖”，对于喜爱昆曲的人，特别是对于昆曲故乡的昆山人来说，已是约定俗成，无可厚非。本书编者通过对戏剧史的真研究，细致分析，将这一说法修改为“百戏之师”，并在凡例中特别注明，无疑更为科学。

通过本书可以知晓昆曲的发生与演变历史。“创立编”分为孕育环境、创立过程、昆曲流播、滋生百戏、普及情况；人物编主要介绍历代昆曲的代表性人物以及当今昆曲的主要传承人及新生代演员；文献编概要介绍昆曲主要剧目及演出团队的情况，收录有关昆曲的相关文献资料；附录记述昆曲堂名、曲社、演出行话、曲坛趣闻轶事